

浅析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

——兼谈钫器及其起源问题

蒋迎春（保利艺术博物馆）

摘要：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在青铜时代大背景下具有特别意义。据现有资料，其始于商末，延续使用至春秋早期，当时既是铜礼器的替代物，也用于日常生活。它们的出现，最主要的目的是节省珍贵的铜料。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钫器，在制作手法上承继了商、西周以来的铜木复合胎工艺，两者关系密切，但它们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区别明显，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漆器；铜木复合胎；钫器；胎骨；装饰

Abstract: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ies, lacquerware combining copper and wood as core material had special significanc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ronze Age. According to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is technique began at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 and was used until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ich was not only a substitute for bronze ritual vessels, but also used in daily life during tha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of its appearance was to save precious copper material.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and Han dynasties, lacquerware with metal inlay decoration along the rim, body or bottom inherited the craftsmanship of copper-wood combination process since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ies, these two techniques were closely related, but had obvious distinctions in terms of shape, func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copper component of Shang-Zhou lacquerware combining copper and wood was mainly used to present a specific appearance which seems more or less like copperware; while the metal components of lacquerware with metal inlay decoration along the rim, body or bottom were often gold or silver, even copper components were either gilded or inlaid with gold (or silver), such technique was initially develope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thin lacquerware. As time passed, it emphasized more on decorative function to imitate gold and silver ware. The change of craftsmanship demonstrates distinct artistic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and shows no direct connection or origi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records, Chinese lacquerware with metal inlay decoration along the rim, body or bottom was first born in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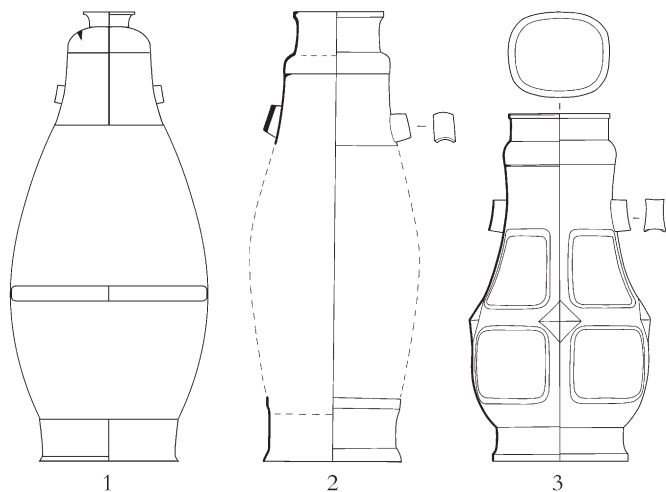
Key Words: Lacquerware; Lacquerware combining copper and wood; Lacquerware with metal inlay decoration along the rim, body or bottom; Body structure; Decoration

商、西周漆器以木胎为主，复合胎亦占一定比例，特别是铜木复合胎，在青铜时代大背景下更具特别意义。尽管已知铜木复合胎数量不多，但它们出土地域广，延续时间长，工艺较为复杂，其出现时间、背景、性质以及与战国和秦汉时期釳器的关系等，不仅涉及漆器研究领域，还涉及漆与青铜两工艺门类的关系、商周时期青铜原料的获取乃至商周礼制等诸多问题。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再作分析、研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考古发现的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

商、西周漆器以铜为饰的现象不少，例如，此时某些漆器的足部等已开始嵌镶铜件替代木构件，北京房山琉璃河^[1]、陕西长安张家坡^[2]等西周遗址和墓地出土的漆盾，上饰人面、兽面等多种形状的铜饰，既可增强防护效果，又能起到恐吓敌人等作用。不过，这几类镶嵌铜饰的方式一般被纳入漆器装饰范畴。铜木复合胎漆器，则专指以铜、木两种材料为胎骨的漆制品，属于器物的成型工艺，主要用作日常器具，以及与之功用相关的祭祀仪式等^[3]。

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铜木复合胎漆器，以商代晚期的河南安阳榕树湾M1所出漆壶（图



图一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壶

1. 安阳榕树湾 M1 : 10 2. 随州叶家山 M27 : 74 3. 随州叶家山 M65 : 27

（1为笔者据《考古》2009年第5期第34页图一〇复原；2采自《文物》2011年第11期；3采自《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一：1）时代最早，其他皆属西周时期。榕树湾M1为商代末年（殷墟四期晚段帝辛时期）的中小型贵族墓，位于今殷墟保护区东边沿外侧，距殷墟宗庙宫殿遗址约2.5千米，已偏离目前所认知的商都核心区。墓内随葬鼎、觚、爵等铜礼器12件，以及钺、戈、矛等铜兵器，多数铜礼器体小、胎薄，器表无纹饰或纹饰简单，一些器物尚存陶范芯，明器化现象较为明显^[4]。距该墓不远、同时代的榕树湾M2，为规模更小的单棺墓，随葬铅鼎、铅觚、铅爵各1件，以及铜铃和少量玉器等物^[5]。

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主要见于河南鹿邑太清宫^[6]、北京房山琉璃河^[7]、山西洪洞永凝堡^[8]和曲沃北赵^[9]、山东滕州前掌大^[10]、湖北随州叶家山（图一：2、3，图二）^[11]、陕西长安张家坡^[12]（图三）和宝鸡竹园沟及茹家庄^[13]等地的西周墓中，涉及壶、罍、盥、盒等器类（附表）。此外，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的“叔作宝彝尊”^[14]，以及散见于其他地点的部分“铜釳件”，也应属铜木复合胎漆器。它们时代多属西周早期，以壶最为常见。

鹿邑长子口墓、曲沃北赵M113及随州叶家山M27、M65、M111的墓主可明确为诸侯国国君或夫人，其他则为贵族，身份等级参差不齐。

其中，长安张家坡M152墓主井叔达生前为周王近臣，家族声名显赫；洪洞永凝堡南区M9属中小型墓，仅随葬一鼎一簋，同期发掘的12座西周墓中至少有七八座的规模都超过此墓；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此类复合胎漆器的4座墓皆属中型墓，以一椁一棺或单棺殓葬，墓主生前地位并不算太高。

透过现有发现可知，此类铜木复合胎漆器使用时间较长，出土地域广，涵盖周王朝广大地区，既包括当时的京畿之地，也涉及晋、杨、燕、薛、曾、长、獯等多个诸侯国，当在西周社会具有一定普遍性^[15]。不过，除张家坡墓地外，其他地点皆出土单一器类，且大都只一件，至多两件，在同墓随葬品中所占比例较小。此外，以上墓葬随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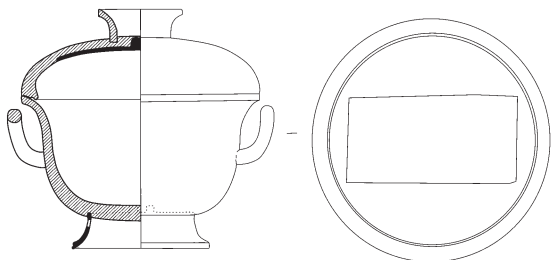
图二 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壶铜构件（随州叶家山 M111 : 149）
（采自《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品中通常有一批质地轻薄的铜器，例如，鹿邑长子口墓出土的相当一部分铜器，壁厚仅0.2~0.3厘米，且凡浮雕双体或单体龙纹并用勾连雷纹作地纹的铜器，均因铜质关系，出土时大部分已变成粒块状^[16]。墓主为晋侯燹父夫人的曲沃北赵M113，随葬铜器“约半数器形小，器体薄”；M114晋侯燹父墓尽管有叔虞方鼎等重器，但不少铜器同样“器薄质差”^[17]。

二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的 工艺面貌与特点

张长寿、张孝光曾将西周漆木器的铜件镶嵌工艺分为箍镶、包镶、平嵌和立嵌四种，它们在实用、加固和装饰等方面各有侧重，或兼而有之^[18]。除平嵌外，其他工艺皆与漆器木胎制作加工有关。

以此为标准，目前发现的铜木复合胎漆壶、壘、盥等，多采用箍镶，主体为木胎，盖、口、腹及足等部位加施铜构件，整体造型与同类青铜器基本一致；口、底等部位往往多出折沿或设凹槽以方便与木胎接合，有的则设穿孔用于固定木胎，张家坡M152漆盥底足铜构件上还加置二凸



图三 西周铜木复合胎漆盥（长安张家坡 M152 : 36）
（采自《考古》1992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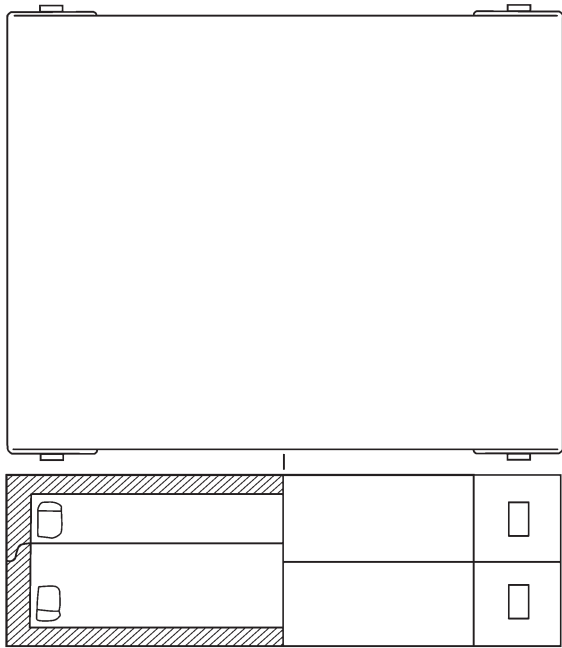
齿以纳木胎。出土数量最多的壶，多于盖、口、足三个部位施铜构件，复杂的还在腹部加施一道铜箍钗，如榕树湾M1漆壶、永凝堡南区M9漆壶；有的则较简略，仅于口、足两部位嵌镶，如琉璃河M253漆壶。

以薄铜片包镶的漆器尺寸均不大。张家坡M176包铜漆盒，长约13.5、宽约10、器与盖各高约2.1厘米，外观与普通铜盒无异，但此盒仅外包一层厚0.1~0.15厘米、锤揲而成的铜片，盒胎木制，内壁髹漆，上设子母口，盖与器扣合后丝毫不露木胎，铜片接合部位设一对长条形穿孔（图四）。春秋早期的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一大一小两件漆盒^[19]，其器形、用材和做法与张家坡M176包铜漆盒几乎完全相同，仅在盒表铜皮上锤揲出折线三角等纹样。

叶家山M65漆壶或可视作特殊的包镶工艺制品，其木质器身外套一重薄薄的铜框架，壶口上再置铜盖，除器腹外，外观大部分仍为铜胎。

现存壶类器物的铜构件尺寸较大，器口部位一般高7~10厘米，榕树湾M1漆壶等的口部铜构件高度超过了10厘米，永凝堡漆壶口部铜构件甚至高达15厘米以上；足部铜构件一般高4.5~7厘米，永凝堡漆壶等亦达10厘米以上。壘、盥的铜构件略窄，高度一般不超过3厘米。这些铜构件普遍轻薄，除转角等部位外，往往仅厚0.2~0.3厘米，前掌大M119和M120漆壶甚至薄至0.15厘米。

反映在装饰方面，已知壶、壘、盥等所嵌铜构件皆光素无纹，而所嵌木胎大都仅残存少量朽迹，其木质与铜质胎体上是否原有漆绘纹样现已



图四 长安张家坡包铜漆盒（M176：3）复原图
（采自《考古》1992年第6期）

不得而知。当时漆器用色以黑、红为主，装饰技法有髹漆、描饰等，漆器木胎部分亦当如此，其与金黄、浅黄、灰白等色调的铜构件形成强烈反差，可取得较好的装饰效果。铜构件上装饰纹样的，目前仅见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西周虢国墓地出土的包铜漆盒，其中竹园沟M20漆盒上、下分饰夔龙纹和凤鸟纹带；茹家庄M2两件漆盒均饰窃曲纹，其中一件器口两侧加铸作腾飞状的对鸟形象，颇为别致。

三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的功用及出现背景

壶、罍属酒器，盥为食器，铜木复合胎漆壶等的功用亦如此。而这些漆器出自墓葬，本身还具有丧葬仪式中的礼器功能。

目前所见铜木复合胎漆壶皆属随葬礼器组合的一部分，或为铜壶的替代品，或单件漆壶与单件铜壶组成一对，或两件漆壶配两件铜壶，再同觚、爵或角等偶数组合的青铜酒器相配。以前掌大墓地为例，M21、M119皆未随葬铜壶，而以铜木复合胎的漆壶替代；M11、M120各随葬1件铜壶，再配1件铜木复合胎漆壶组成偶数组合，

然后与觚、爵、觶等共同构成酒礼器组合。长子口墓、叶家山M111等亦皆如此。

需说明的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铜壶往往单件出土，西周晚期才普遍成对随葬，此类铜木复合胎漆壶的发现突破了既往认识——或许有的西周早期贵族墓也曾以漆木壶与铜壶构成一组，只是漆木壶保存不佳或难以辨识。

西周时期以漆礼器替代铜礼器的现象不少。例如，叶家山M28曾侯谏墓随葬1件漆觚，出土时与目雷纹铜觚及2件铜尊、2件铜卣、2件铜爵、1件铜觶、1件铜盃共置漆禁之上，其与目雷纹铜觚构成一组，在数量上与2件铜爵相配^[20]。琉璃河M1043亦随葬1件漆罍和1件铜罍，漆罍出土时被压在铜罍之下，两者配套使用^[21]。

出土铜木复合胎漆罍、漆盥的张家坡M152因盗扰严重，其铜礼器组合情况已不得而知。不过，现存漆罍和漆盥的造型、装饰皆一致，数量达3件之多，自然加入墓内随葬礼器组合中。其中，达盥盖内嵌贴有5行40字的铭文铜板，铭文记述周王赐井叔达以驹一事，达因此“用乍（作）旅盥”——实为带盖附耳圈足簋，铭文字数多，格式等皆与同类铜器一致，当年不仅将之视同铜礼器，还是墓主井叔达生前用器^[22]。

作盛储用的包铜漆盒则不然，它们外观与铜盒无异，豪华美观，具有铜器的观感和触感，但质地轻便，可随身携带，当为墓主生前常用之物——此类包铜漆器的行用，说明在时人心目中铜器的贵重程度远大于漆器。竹园沟M20漆盒出土时内盛铜梳、发笄、小刀、铜凿等小件器物^[23]，与后世妆奁盒类似；茹家庄M2井姬墓包铜圆盒出土时内存鸡骨^[24]。它们与壶、罍、盥等复合胎漆器不仅在制作工艺和装饰方面不同，功能及使用方式上亦明显有别，前者为日常用具，后者被视同铜礼器。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史前文化的漆器就已经与玉石器、彩绘陶器等共同承担了礼器功能。随着青铜冶铸工艺成熟，成组青铜礼器出现，此前以多种材质器物组合的

礼器群在商代后期发生重大变化，漆器在其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种类仍相当完备，除受木胎材质所限而无法制作的温酒器和烹煮器外，几乎涵盖所有酒礼器和食礼器，特别是漆豆，其在食礼器中重要性突出，出土数量众多，而与此相对照，铜豆却十分罕见。目前发现的商代铜豆，只有山东长清出土的铜豆^[25]及在北京废铜中拣选所获铜豆^[26]等数例而已，它们外壁皆装饰仿蚌泡的圆涡纹，明显仿自漆豆。西周时期的祭祀及宴享等活动中，被称作“鬯器”的嵌蚌泡、蚌片漆器颇为流行；而漆俎与铜鼎相配的严格使用制度，更凸显漆制礼器的特殊意义。铜木复合胎的漆壶、罍等，就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此类铜木复合胎漆器的出现，应是为了节省铜料，当与商末商王朝政治势力的衰退和对金属资源的控制力下降有关^[27]，以致包括王畿在内的一些地区铜料及锡料缺乏，安阳榕树湾墓群、宝鸡石鼓山墓群^[28]及稍晚的鹿邑长子口墓等多地出土铜器的情况，皆说明了这一点。及至西周时期，中央王朝控制、运输不便、铜料来源不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铜料紧张情况依然存在。类似殷墟郭家庄M160那样随葬明器类兵器的现象^[29]，在西周时屡见不鲜。例如，出土包铜漆盒的竹园沟M20，即出有实用铜戈5件和明器铜戈6件^[30]。铜料供应，恐怕是摆在先秦许多中小贵族甚至是部分大贵族面前的持久难题。贵为周王近臣的井叔达，自作用盥也不得不采用铜木复合胎加内贴铭文铜板的方式将就了事。而对一些中小贵族而言，铸造成套青铜礼器压力更大，制作大件铜器时以木代铜，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因此以木代铜的器物多为壶，应与其形体大、用料多且漆木壶使用广泛等有关。但在具体制作过程中，这些铜构件薄且宽大，有的铜构件所占器体表面比重已超过器物整体表面积的一半，标示其为铜器的意图相当明显。至于殷墟郭家庄M160等随葬明器类铜兵器、鹿邑长子口墓等随葬一批质地轻薄铜器的现象，恐怕也与铜料不足有一定关系。

为了满足礼制需求，此类西周铜木复合胎漆

制礼器的生产遍及多地，但绝非主流——出土数量如此之少，绝非能够以考古发掘存在较大偶然性来解释，而且同墓中皆有一定数量的铜礼器随葬，它们作为铜礼器替代品的性质相当明显，其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与铜礼器相比尚有不小差距。

包铜漆盒的制作，可能是出于内衬木片可增加强度并减轻重量，且方便使用的考虑^[31]，但其外观毫不显露木胎，刻意追求铜器的外观效果，也可佐证其中节省铜料的原因。

四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与战国秦汉钫器的关系

这些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所嵌铜构件往往被称作“铜钫”，并被一些学者视作中国最早的钫器^[32]，进而突破了钫器兴起于战国时期的传统认知^[33]。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金部》：“钫，金饰器口，从金从口，口亦声。”^[34]“钫器”一词，最早应见于西汉扬雄《蜀都赋》——“雕镂钫器，百伎千工”^[35]，而此前后的《盐铁论》《汉书》等汉代文献中关于“银钫黄耳”“黄金钫器”一类相关记述颇多，其当属汉代的通行称谓。在漆器口、腹及足等部位镶嵌金属箍钫，是汉代流行的漆器装饰工艺，各地多有此类钫器出土，蜀郡、广汉郡两工官作品更是名噪一时。纵观汉代钫器，其所嵌箍钫除用于加固器身外，更多体现在装饰方面，且随时间推移，装饰功能愈发突显。西汉前期，箍钫多施于器口、腹及底，还具备一定的加固胎体功能。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箍钫逐渐变薄，宽度增加；有的器物器体不大，却上下嵌钫，远超实际需要。例如，安徽天长三角圩M1桓平墓出土的一件西汉漆圆奩，奩盖径15、盖高11.1厘米，从上至下竟镶6道银钫，奩身高10.2厘米，亦施4道银钫^[36]（图五）；江苏泗阳陈墩西汉墓M1漆五子奩的奩盖，直径17.5、高11厘米，通体施5道银钫^[37]。类似情况在西汉后期颇为常见。还有，奩、盒类器物的盖及盘内底等部位，作为装饰重点，往往架屋叠床，踵事增华——在盖沿之外，还于盖顶



图五 天长三角圩桓平墓出土漆奩（M1：2）
（天长市博物馆提供）



图六 枣阳九连墩M2出土卷云纹漆樽
（M2：W319）（郝勤建摄）

中间部位再加施一道釦，它们与盖顶中心所嵌贴的金银薄片往往占据器盖大部分壁面，格外醒目。盖顶中间部位的这道箍釦，和漆盘内底所施箍釦一样，纯系装饰，无任何实际功用。

如仅从字面理解，将商、西周时期此类铜木复合胎漆器称作釦器亦无不可，但细究起来，两者差别明显。其中最直接的区别是，商、西周时期的铜箍釦形体宽大，有的甚至高达10余厘米，如此体量的铜构件似难称“釦”。与之相比，汉代漆器上的金、银、铜等质地的箍釦则要纤细得多。更重要的是，两者功能差异显著：商、西周时期，铜构件与木构件嵌接或榫接，两者共同构成漆器胎体，铜构件更多展现其作为铜器的性质与面貌，与汉代釦器箍釦的装饰意义有着本质区别。此外，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予人以铜器或至少是部分铜器的感觉，是青铜时代艺术和审美的产物；汉代釦器的金属箍釦多用金、银，即使是铜釦，往往也表面鎏金或错金银，希望给人以金银器的感觉，展现铁器时代的艺术和审美特色。

从汉代釦器向前追溯，装饰类似功能箍釦的漆器最早为战国中期制品。这些箍釦大都纤细精巧，多铜质（含鎏金、鎏银）、银质，施于卮、樽等类薄木胎和卷木胎漆器的口、腹、底等部位，目的在于增进薄木胎强度，特别是卷木胎接合部的粘接牢度以避免松脱。这是漆器大规模应用于日常生活背景下的产物，就像包铜漆盒一样，日用漆器需要美观、轻便、合用、耐用，而

镶嵌此类箍釦便是当时解决漆器轻薄兼顾坚固问题的主要方案之一。釦器发明亦主要源于此。

战国中晚期的釦器，在中原北方地区更为常见，当与该区域悠久的传统金木复合工艺有关。河南洛阳金村^[38]、河北平山灵寿故城^[39]等出土的漆壶、漆奩等，多施鎏金或鎏银铜釦，颇为精美。已知楚文化釦器皆属战国中期偏晚及晚期制品，目前在湖北枣阳^[40]，湖南长沙^[41]、桃源^[42]，安徽舒城^[43]，以及江苏扬州^[44]等地有少量出土，它们多为口、底镶铜釦，底釦上铸接三蹄足，腹施铜釦的较少，其中枣阳九连墩M2漆樽的口沿、底沿各镶一铜釦，釦上还阴刻波折纹和卷云纹，工艺十分考究（图六）。至于蜀地釦器的出现，则要晚至秦据巴蜀以后，当与秦文化等影响有关。

简而言之，铜木复合胎漆器诞生于商末，西周早中期较为多见，当时既是铜礼器的替代物，也用于日常生活。它们的出现，最主要目的是节省珍贵的铜料。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釦器，在制作手法上承继了商、西周以来的铜木复合胎工艺，两者关系密切，但它们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区别明显，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据现有资料，中国釦器最早诞生于战国中期。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特致谢忱！

注释:

-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210~21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314~3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3] 商周时期,戈、矛类兵器的秘等部件,以及车的輿、轮等部位也往往髹漆,但一般不将其纳入漆器范畴。
- [4]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榕树湾一号商墓》,《考古》2009年第5期。
- [5]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第109~110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编:《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
- [8]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
-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1] 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c.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
- [13] 宝鸡市博物馆编辑:《宝鸡強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 [14] 陈梦家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第643页,中华书局,2019年。张长寿、张孝光最早指出这一点,参见《西周时期的铜漆木器具——1983—86年沔西发掘资料之六》,《考古》1992年第6期。
- [15] 徐良高:《由叶家山墓地两件文物认识西周木胎铜釭壶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 [1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编:《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第91页。
- [17] 同[9]。
- [18] 张长寿、张孝光:《西周时期的铜漆木器具——1983—86年沔西发掘资料之六》,《考古》1992年第6期。
- [19]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 [2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 [22] 张长寿:《达盪盖铭——1983—86年沔西发掘资料之三》,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新二期,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收入张长寿著:《商周考古论集》,第12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3] 宝鸡市博物馆编辑:《宝鸡強国墓地》,第192页。
- [24] 宝鸡市博物馆编辑:《宝鸡強国墓地》,第374页。
- [2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 [26] 程长新等:《北京拣选一组二十八件商代带铭铜器》,《文物》1982年第9期。
- [27] 袁晓红:《西周中央王朝的金属控制策略——以雒邑地区出土西周铜器金属资源研究为中心》,朱岩石主编,考古杂志社编辑:《考古学集刊》第22集,第2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另,据对殷墟郭家庄M160等出土青铜器的成分检测,有学者认为,由于年代的延续及大量

- 青铜礼器和兵器的铸造，商代晚期锡料已匮乏，参见季连琪：《河南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研究》，《考古》1997年第2期。
- [28] 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
b.张天恩：《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文物》2015年第1期。
- [29]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b.季连琪：《河南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研究》，《考古》1997年第2期。
- [30] 宝鸡市博物馆编辑：《宝鸡虢国墓地》，第194页。
- [31] 同[18]。
- [32] a.张建世：《扣器源流》，《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
b.傅举有：《中国漆器金银装饰工艺之三——金银钹漆器》，《紫禁城》2007年第7期。
- [33] a.王世襄编著：《中国古代漆器》，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b.朱学文：《试论钹器法在战国秦汉漆器制作中的应用》，《文物》2014年第7期。
- [34]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295页，中华书局，1963年。
- [35] [汉]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3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天长三角圩墓地》，第63~65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37] 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文物》2007年第7期。
- [38] [日]梅原末治著：《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同朋舍，1984年。
- [3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髹漆——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4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九连墩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6期。
- [41] 湖南省博物馆等编著：《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 [42] 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桃源县文化局：《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第22~32页，岳麓书社，1987年。
- [43]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编辑部编：《文物研究》第6辑，第135~146页，黄山书社，1990年。
- [44] 扬州博物馆：《江苏扬州市西湖镇果园战国墓的清理》，《考古》2002年第11期。

附表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出土情况一览表

序号	墓葬	时代	墓主身份	器类及数量	构件及尺寸	墓葬情况	随葬器物
1	河南安阳榕树湾M1	殷墟四期晚段	中小贵族	壶1	现存盖、口、腹及足四部位铜构件，出土时口沿尚存部分木胎残迹。盖作覆钵形，上有喇叭形捉手。口部构件上、下径分别为9.4和11.5厘米，高12.5厘米。圈足构件直径15、高4.5厘米	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墓口长3.4、宽1.66~1.74米。一椁一棺，有殉人1	随葬铜鼎、觚、爵各2件，甗、觶、卣、尊、罍各1件，另有铜工具、兵器及玉石器等
2	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西周早期	长国国君长子口	壶1	现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盖作覆钵形，口径11.7、高6.2、壁厚0.2厘米。口部上径11.7、下径14.5、通高9.6、壁厚0.2厘米，口宽平沿内折，两侧有贯耳。圈足部位上径15.6、底径15.1、高7.4、壁厚0.2厘米	墓葬保存基本完整，为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口长9、宽6.63米。一椁重棺，有殉人14	随葬器物较多，其中铜礼乐器85件，包括鼎22、簋3、鬲2、甗2、觚8、爵8、角2、觶5、卣6、壶1、尊5、罍3、觥3、罍2、斗4、盘1、盃1及编铙2套6件
3	北京房山琉璃河M253	西周早期	燕国贵族	壶1	存口部及足部铜构件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5.1、宽3.5米。两椁	随葬鼎6、簋2、鬲4、甗1、爵2、觶1、尊1、卣2、壶1、盘1、盃1等铜礼器

续表:

序号	墓葬	时代	墓主身份	器类及数量	构件及尺寸	墓葬情况	随葬器物
4	山西洪洞永凝堡南区M9	西周早期	姑姓杨国贵族	壶1	存盖、口、下腹及足四部位铜构件。盖径10.6~11.2、腹最大径18.2、足径12.4~13.5厘米。盖顶有喇叭形捉手。口两侧设贯耳,内嵌入空心圆木,制成子母口。铜构件皆内折,与木件外侧所设折棱相咬合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3.3、宽1.8米。一椁一棺	随葬铜鼎、簋各1件,另有铜戈等兵器
5	山东滕州前掌大M11	西周早期	滕国贵族	壶1	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器口部位口径15.3、高6.4、厚0.2厘米,方折沿,两侧有贯耳,与耳相对应的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足底径23、高5、厚0.2厘米,筒形,底边向内翻折,两侧有对应穿孔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3.77、宽1.96~2.08米。一椁一棺,有殉人1	随葬鼎8、簋1、罍1、甗1、甬1、尊1、觚4、爵5、角2、卣2、斗1、盃1、盘1等铜礼器
6	山东滕州前掌大M21	西周早期	滕国贵族	壶1	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口部尚存木胎痕迹。盖与口部分上径16.4、盖高8、通高17.2、壁厚0.2厘米,盖上有椭圆形捉手,口沿部位两侧设桥形贯耳。圈足部位底径19.8、高7.6、厚0.2厘米,呈喇叭形,两侧各有一“T”形扉棱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3.28、宽1.74~1.85米。一椁一棺	随葬鼎1、簋1、尊1、觚3、爵3、罍1、卣1、觶2等铜礼器
7	山东滕州前掌大M119	西周早期	薛国女性贵族	壶1	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盖与口部分口径14.4、底径17.2、盖残高9.4、通高18、壁厚0.15厘米,盖顶有圆形捉手。圈足直径18.8、通高7.9厘米,作筒形,两侧有穿孔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3.38、宽2.27米。一棺	随葬鼎2、簋1、觚2、尊1、角4、卣1、觶1等铜礼器
8	山东滕州前掌大M120	西周早期	薛国女性(?)贵族	壶1	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盖、口与M119所出相近,口径17、通高16.6、壁厚0.15厘米。圈足部位铜构件直径22.4、高6.8、厚0.2厘米,两侧有对应穿孔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3.68、宽2.1米。一棺,有殉人1	随葬鼎3、簋1、甗1、鬲1、壶1、尊1、觚2、爵2、角2、卣1、斗1、觶1等铜礼器
9	湖北随州叶家山M27	西周早期	曾侯夫人	壶2	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并有少量漆木朽迹。盖作喇叭形筒状,顶内侧设凹槽以纳漆木板。口部口径11.6厘米,两侧设桥形贯耳。足部底径15.4厘米,底内折出一凹槽以纳壶底	墓葬被盗,但保存基本完整,墓口长6.7~6.8、宽4.9~4.95米。一椁一棺	随葬鼎5、簋4、鬲2、甗1及尊、觥、觶、爵、卣、罍、盘、盃、壶等铜礼器
10	湖北随州叶家山M65	西周早期	曾侯谏	壶1	存铜盖和器体上铜外壳骨架,腹、底部有漆木板朽痕。盖上有圈状捉手,无顶,盖沿外折,内侧刻划一“十”字形符号。器口呈椭圆形,平沿内折,长颈,下部两侧各有一贯耳,内侧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宽带状斜腹壁外撇,溜肩,鼓腹,无底,椭圆形圈足外折呈直壁阶状,两侧各有一穿孔。通盖高43.6、口径14×11.6、腹径22.8×18.6、足径17.2×13.5厘米,残重1580克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5.02、宽3.5~3.62米。一椁两棺	随葬鼎7、簋4、鬲1、甗1、尊1、觶1、爵2、卣1、盃1、盘1、壶1等铜礼器

续表:

序号	墓葬	时代	墓主身份	器类及数量	构件及尺寸	墓葬情况	随葬器物
11	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	西周早期	曾侯伋	壶2	存盖、口、足三部位铜构件。盖径14.4、高7.6厘米,重375克,上有捉手,盖口缘弧折。口部上径13.4×14.4、下径13.2×14.9、高7.4厘米,重675克,口沿内折成沿面。足部上径14.8×15.2、下径16.5×17.1、高4.4厘米,重395克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13.08~13.18、宽10.1~10.28米。至少一椁一棺	随葬铜礼器有鼎20、簋12、鬲1、甗1、甗3、尊2、壶2、罍1、爵4、觚1、觶2、盘1,以及铸钟、甬钟、编铃等乐器与戈、钺等大批铜兵器
12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113	西周早中期之际	晋侯燹父夫人	壶(?) 2	存盖、口、足三部位饰件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4.2、宽3.2米。一椁一棺	随葬鼎8、簋6、甗1、卣2、壶1、猪尊1、琮形器2、小三足瓮1等铜礼器
13	陕西长安张家坡M61	西周早期	井叔家族女性成员	壶1	仅存口部铜构件。椭圆形口,长径两侧有一对贯耳,上口径12.5×11、下口径12.3×10.5、高3厘米	墓葬遭盗扰,墓底长3.9、宽2.6米。内存椁迹	随葬品残存釉陶器、玉饰等
14	陕西长安张家坡M152	西周中期	井叔达	盨3、 鬲3	盨存圈足部位铜构件及镶于盖内的带铭文铜板。圈足上径7.5、底径9.5、高2.5厘米,上口两侧各有一凸齿,相对两侧各有一长条形穿孔。鬲仅存器口及底铜构件,口部上径21.5、沿宽1.7、下径20、高2.2厘米;器底上径21.5、底径20、高1.3、内折部分宽1、厚0.35厘米	墓葬遭严重盗扰,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墓室南北中长5.9、南宽3.9、北宽4米。一椁两棺并有头厢	随葬品残存鼎耳和戈、剑等铜兵器,以及石磬、玉饰等
15	陕西长安张家坡M176	西周中晚期之际	井叔家族女性贵族成员	盒1	以铜片包镶漆木胎上,长约13.5、宽约10厘米。用青铜锤揲而成的厚0.1~0.15厘米的铜板包镶,木胎作子母口,器盖相合不露木胎。外观为铜盒,内髹漆	墓葬遭盗扰,墓底长4.68、宽3米。一椁两棺	残存随葬品有釉陶器、玉饰、蚌饰等
16	陕西宝鸡竹园沟M20	西周早期	獫狁贵族	盒1	现存圆筒状盒身铜构件,口径23、高10.9厘米,上、下各有八组钉孔,每组两孔;上、下各饰夔龙纹和凤鸟纹带	墓葬保存完整,平面呈梯形,墓口长3.9、头端宽2.95、脚端宽2.5米。一椁一棺	随葬有铜礼器鼎2、簋2,以及铜工具、玉石器等
17	陕西宝鸡茹家庄M2	西周中期	虢伯夫人井姬	盒2	鸟耳盒、窃曲纹盒各1件,存圆筒状盒身铜构件,内有木质朽痕。鸟耳盒盒身构件口径11.6、通高8.4、盒高4.6厘米,底沿内折并微外扩,口沿两侧有对称鸟形耳,外壁饰一周窃曲纹。窃曲纹盒口径18.6、底径20.4、高4.5厘米,底沿内折,下垂外扩,周壁有方形钉孔并饰窃曲纹	墓葬保存完整,墓口长4、宽3.2米。一椁两棺,有殉人2	随葬有铜礼器鼎6、簋5、鬲3、甗1、卣2、盘1、铜人1,以及玉石器等

注:“随葬器物”列中部分随葬品较多的墓葬仅列出铜礼器;北京房山琉璃河M253发掘报告未述出土漆壶尺寸;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113发掘简报未述出土漆壶器形及尺寸。